



让长征文化遗产长久存传

□ 张吉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长征遗址遗迹就是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对其考证、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题成果《长征遗址考证与保护管理》专著，全景式展示了长征遗址的基本现状，揭示了长征遗址的文化价值，提出了长征遗址保护的实践策略，是一部该领域考史性、析性、政策性研究相统一的学术新作。

该专著系统扎实地考证了中央红军长征遗址。作者以红军长征所处的历史时代、长征进程的线路和地域为时空背景，以长征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点战役、重要人物为重点，对长征出发地到湘江战役、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和会理会议、强渡大渡河到翻越六盘山、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终点吴起镇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地会宁和将台堡等一系列长征遗址，展开了认真细致的考证和比较广泛的调研。红军长征军情之复杂、战事之险恶、征程之艰险，世所罕见，史所罕闻；且长征距今90年的历史，因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时空落差。因此，对其遗址实地考证调研是认知历史客观真实、

揭示长征史实真谛的必然要求，定要下一番真功夫、实功夫。

作者采用实地考证、遗址考证、文献史料比证、专家交流论证、人物访谈考证的方法，纪实了长征遗址的多维现实面貌；分析了长征遗址的分布、结构、内涵与保存保护状况，长征遗址保护管理和保护性利用情况，以及长征红色文化教育和长征精神弘扬情况等；核证了长征遗址标识和内容存疑的问题；诊断了自然环境变异、人文环境变化对长征遗址保护管理带来的挑战。考证方法的适宜和严谨，保证了专著结论的客观、准确。同时，作者立足保护性开发利用的更大视野，既注重宏观层面的研判判断，又下足了微观层面的校正功夫，展露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该专著揭示了长征遗址的文化和精神，阐述了长征遗址保护管理的时代价值。长征遗址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资源，更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遗产论，研究红色资源；而以文化遗产论，研究的指归则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该专著从红军长征历史进程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出发，研究长征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分析长征主体、事件与遗址生成的关系，研析长征遗址生成的内在逻辑、文化内涵和特征；并深刻阐释了长征遗址的时代价值。长征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锻造了一个成熟的党和党中央领导集体；长征铸就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魂，锻造了一支成熟统一的人民军队；长征是人类精神的丰碑，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脊梁；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为新时代注入固本守正的红色基因。这不仅深化了长征遗址与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内在本质联系的研究，而且把伟大长征的时代价值、长征遗址的价值、长征遗址保护管理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聚焦到利用好长征文化资源、传承好长征红色文化、弘扬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显示了该著作的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



▲《长征遗址考证与保护管理》李杨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址的时代价值。长征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锻造了一个成熟的党和党中央领导集体；长征铸就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魂，锻造了一支成熟统一的人民军队；长征是人类精神的丰碑，铸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脊梁；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为新时代注入固本守正的红色基因。这不仅深化了长征遗址与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内在本质联系的研究，而且把伟大长征的时代价值、长征遗址的价值、长征遗址保护管理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聚焦到利用好长征文化资源、传承好长征红色文化、弘扬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显示了该著作的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

该著作提出了加强长征遗址保护管理的实践策略。作者基于调研的结果和长征文化遗址遗产的特点，结合长征国家公园建设关于保护为主、加强管理的要求，运用管理学与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交叉方法，就长征文化遗址遗产保护的领导和组织架构、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外部管理大格局、保护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创新、法规、政策、保护资源的供给与保障等，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务实的对策。值得一提的是，提出了抢救性、预防性、数字化技术性保存保护等新思路、新方法；并对加强保护管理的人力资源、数字和信息技术、物态和文化资源等方面的供给与保障，提出了新的实践策略。可见，该著作从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科技理性与法治理性、学术性与政策性的有机统一上，对解决长征文化遗址遗产保护管理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前瞻思考与有效回应。

作者以大历史观跨越时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与精神品格。长征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具有不可复制性、价值的永恒性。该专著为相应的长征遗址和纪念馆提供了成果服务，为开展长征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成果支持；为深入学习和深化研究长征历史，保护、保存和传承长征文化遗产，提供了一部新颖可读的好作品。



俯首人间正道

□ 陈炜

两度高考落榜的乡村青年张英才站在人生的岔道口，焦急地等待着乡村教育站万站长带给他命运的拯救。万站长是张英才的亲舅舅，半个月后，他将会把仅有的两个代课名额，一个给他的亲外甥张英才，另一个给他初恋情人的儿子张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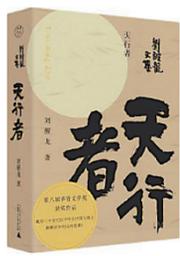
故事由此展开。《天行者》是作家刘醒龙的代表作之一，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20世纪后半叶的乡村教育境况为背景，对基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和观照，为当代乡村民办教师群体画像。故事以深山中的界岭小学为空间载体，人物形象不多，关系也不复杂。全篇以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为主要叙事中心，以三次转正机会为线索，传达作者对人生、人性、时代的理解。可以说，界岭小学是中国乡村小学缩影，发生在界岭小学的所有喜怒哀乐，也许正在时代版图上任意一所乡村学校上演。

张英才被分去了界岭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他体味着乡村教育的现状，也感受着界岭小学“刘关张”的生活困境：老好人余校长既要照顾瘫痪妻子，又承担着十几个寄宿学生的吃住管理；节俭至极的副校长邓有米，将转正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清高孤傲的教导主任孙四海，与丈夫妻子王小兰苦恋多年，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们活得卑微艰难，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时暴露各自的人性弱点和心理暗疾，既有民间英雄的道德光辉，也有普通人的鼠肚鸡肠。文中叙事细节丰富，如界岭小学独特的升旗仪式，孙四海的笛声，断弦的风琴，王小兰炒油盐饭，孙四海种茯苓……这些唯美的精神意象和艰难中的乡土浪漫给人深刻的心灵震撼。

20世纪后半叶，民办教师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凭借心中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爱支撑着当时乡村教育的半边天。同时他们又是非常特殊的，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为代表的几代民办教师身上具有民办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围绕转正，他们内心的挣扎、人性的考验、生活的悲剧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万站长因不光彩的转正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蓝飞因不正当的转正受到了包括母亲在内的群体蔑视，余校长和孙四海、邓有米三个界岭小学“元老”也只有到了转正时才会爆发真正的“勾心斗角”，而爱芬则为转正疲疲而失去了一切。

转正，成了这所乡村学校民办教师

▲《天行者》刘醒龙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的内心执念，也是他们灵魂的试金石。戏剧性的是，书中的三次转正机会，无一不是从开始的摩拳擦掌到最后的拱手相让，况味深深。而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的“刘关张”终于在谁，如果没有同时的三个指标，他们在谁谁谁做不到狠心丢下别人自己转正，由此，他们从最初狂热的转正心态变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共识。

脚踏泥泞，却心比金坚。多年的患难与共，早已情同手足。当来之不易的转正名额到来时，他们割舍不下身边的同事，一次次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物质上的贫困者，却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正是这样逆境中的高贵让人动容，在全书疼痛苍凉的底色上增添了情感的暖色。

故事的最后，结局并不完美，依然有各种痛苦和无奈。生命充满遗憾，有时候越想得到的东西，越难以获得。时代的潮流汹涌而来，转型期的阵痛之下，命运的沉浮身不由己。好在希望还在，村霸被拉下来了，余校长终于转正了，张英才又回到界岭。

想起书中多处提到的“界岭小学之‘毒’”。是什么东西能让人中毒呢？之前张英才告别界岭去教育学院读书时，万站长说的一番话或可作解：“想说界岭小学……总是让人放心不下……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而命运的诡谲再次出现，走出了大山的张英才又回到了界岭，这样的选择同他起初迫切地想离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命运的齿轮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转动。

难得有这样一部小说为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作证，为乡村民办教师画像，作为不容忘记的群体，那些心怀大义的人都中了“界岭小学之‘毒’”，他们俯首在人间正道上。

枪炮、家国与银行

□ 黎江毅

朋友推荐我阅读张卫平的长篇小说《红色银行》。近年来，革命战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这部作品以创办农民银行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讲述兴县农民银行从萌芽初生到发展壮大，直至汇入中国人民银行的故事，精彩地展现了我在金融战线上的创举，题材新颖，独辟蹊径。

我喜欢书中硝烟弥漫的斗争场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共生，相辅相成。无形的金融战线弹道无痕，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刀光剑影的战争。小说把红色银行发展融入革命战争的背景之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小说主人公刘象庚带着任务从太原回到故乡，家人始终面临着死亡威胁，在一次战斗中，兄嫂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刘象庚虽然是个文学家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金融历史上，有很多真实原型。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牺牲时年仅34岁……红色金融经过革命炮火的洗礼，凝聚了共产党人的智慧与胆魄、汗水与心血。

我喜欢书中前仆后继的家国情怀。土地革命时期，“实行平价借贷”“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实行低息借款”……这些淳朴的金融思想萌芽本质上是对“金融盘剥”社会矛盾的纠偏，希望通过金融手段维护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在小说中，“兴县农民银行”不仅服务于抗日力量，还服务于当地百姓，解决百姓生活的困难，体现了金融工作的人民性。小说中，贺家渡船被撞坏了，生活陷入困境，贺小莲无奈去找刘象庚求助，银行采取灵活放贷的办法，帮助贺家重新建造起了新船。

“兴县农民银行”毕竟是虚构的，真实历史上的红色银行诞生在江西瑞金。1932年2月1日，新生红色政权下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今天，我们参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看到的是一座两层高的土楼房子，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三个房间，被称作“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正是在如此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红色银行在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区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兴起，造纸、织布、铁器、榨油、砖匠等行业都得到了国家银行的扶助支持，红色银行成为“苏区经济擎天柱”。

锤镰已教山河改，莫忘弹铗凛冽时。合上《红色银行》一书，经受过那段跌宕而光辉的共和国金融史的思想洗礼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改造世界。



跃上更为高远的 美的峰巅

□ 叶青

近日，作家刘上洋又一散文集《难以攀登的美》出版。这部文集收录了作者2011年以来创作的36篇散文，字里行间饱含着对祖国、家乡与生活的热爱，渗透着对历史、现实与生命的思考，洋溢着豪迈壮阔的诗意情怀。其中《万里长江第一湾》《波涌浪卷西沙情》《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堂》《一座围屋的回响》等篇在发表之初即引起读者好评与热议，此次结集出版，使读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作者近年散文创作收获的全貌，这无疑令人欣喜和期待的。人夜捧读这部文集，很多文章在首发时即已拜读并留下深刻印象，这次集中重读，熟悉之中又生发出许多新的感悟。

文集里的36篇文章以内容和主题分为五辑，从中可以领略到作者文化思考和文学笔触所达到的辽阔疆域。第一辑中的《万里长江第一湾》无论就其内涵、影响力还是在本书所开位置而言，都是一篇重量级文字，堪为作者近期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历代写长江的诗文浩瀚而多彩，《万里长江第一湾》独将目光投向长江在云南丽江崇山峻岭中划出的那个巨大弧形，可谓立意独特；更为精彩的是，其文字并非仅仅停留在讴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是层层推进地书写了作者对中华文明演进、对中国革命探索乃至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的深层思考与讨论，使大自然壮阔景观与人类进步的恢弘乐章互为镜像，于是“雄健之气迎面扑来，感人至深”（古邦语）。

读罢此文，深感其中厚重磅礴的精神承载与表达，集中体现了刘上洋散文的特色。这种特色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文章选题命意独具匠心的开掘。作者曾自言“我的散文都是苦出来的”，体现出作者对于散文写作的认真态度，严肃的写作首先就体现在其对文章选题立意的自我要求——所选之题必有饱满的人文内核并具有多维展开、给读者以启迪的潜质；二是如草原驰骋又如深海沉潜般奔放而深入的思考。即便是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话题，在作者笔下也必通过独立而深入的思考，将现实的感悟、纷繁的信息、各方的见解融入思想容器中加以酝酿萃取，形成独到见解，方肯捧出与读者分享。三是雄浑劲健的笔力与美学特质。博大深邃的思维建构与思想呈现必然需要坚实、刚健的文字支撑，“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正因有此刚健充实之气，作者散文形成了昂扬、爽俊而又劲健雄放的美学底色。

以本文集而言，如《万里长江第一湾》这样在选题上即先声夺人的篇章并不多见，但对于文章主题的选择与开掘仍一再体现出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独到眼光与发现。如文集第二辑中的《万寿宫：江右商帮的精神殿堂》等篇，作者均选择了江西读者比较熟悉的人文话题，却能作出十分深刻而独特的文化思考。万寿宫和江右商帮是江西本土重要文化符号，历来为学者所津津乐道，也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作者对历史长河中的万寿宫与江右商帮的讨论，却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巨大的且越深入越引人探寻的思考空间：江右商帮何以万寿宫作为自己的精神殿堂？江右商帮有着怎样的精神特征？江右商帮既然拥有自己的优势，为何并未产生声名显赫的巨商大贾？与著名的晋商、徽商相比，江右商帮的特点是什么？局限与劣势又在哪里？以层层递进的文化追问为逻辑，立足于宏大历史坐标和当代视角，作者对江右商帮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充满启迪性的、全面而深刻的探讨，其中包含着深厚的情感倾注，更体现出大视野和大胸襟之下的理性沉思。与该文相似，第二辑中《天下第一家——义门陈轶事》《一座围屋的回响》《点赞“抚州蛤蟆头”》等文，都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江西历史中那些孕育、创造、传奇和荣光的深刻书写。对“义门陈”300余年历史的全景式叙述，完整清晰，细节生动，笔力雄浑，波澜壮阔；对赣南客家围屋典范关西新围前世今生的书写，体现出作者对一个文化话题的纵横开掘能力。《点



▲《难以攀登的美》刘上洋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赞“抚州蛤蟆头”是作者立意要为“抚州蛤蟆头”翻案的独特文字，作者对这个长期以来被视为贬义的称呼深入辨析，选题上即堪独特；但本文的重心显然未停留在对一个称呼的溯源与翻案，而是进而揭示了这一称呼中凝聚的先民的科学智慧、生育观与生态观，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处，推演出抚州地域人文精神的精彩与可贵。这篇文字在文集中并不算很长，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选题与立意开掘、文本建构等方面与众不同的追求。

作者散文的特色在文集其他部分同样得到体现。文集第三辑主题聚焦于西藏的自然景观、历史风情和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第四辑则是作者对域外多国历史、现实及古今变迁的记录与思考。其中第三辑以如此集中笔墨书写某一区域性主题，这在作者散文创作中并不多见，这一组散文的诞生与作者一段特别的工作经历有关，其中《永远的布达拉宫》一文以布达拉宫漫长的建造史为切入，以布达拉宫多彩的人文景观为线索，串联、浓缩并清晰地讲述了一部汉藏一家亲、中华大一统的历史，主题深刻而富于时代气息。第四辑中的《迪拜的恐惧》《干渴的大瀑布》《坎昆之殇》等多篇文章，以深入历史深处的笔触，透过大自然的沧桑巨变，聚焦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承载之间的矛盾，包含着切肤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情怀。值得一提的是文集的第五辑，其中文章大多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这些文字留下的是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珍贵回忆，真切而坦率，在那些朴素、温暖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感恩之情，并升华出对于人生和时代的丰富思考。

正如散文理论家古敏锐指出的，刘上洋散文中始终不变的“是恪守一种文章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私人化写作盛行、文学叙事日益转向狭小内心空间的自我凝视的潮流下，刘上洋仍然坚守着文学的“正道”功能，这种文学使命已深入笔端和思维深处，成为其写作的前提。作者行走在广袤的大地、驻足于时代的坐标，思接千载，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作者善于全景式观照生活、整体性地把握时代，进而对社会生活进行哲学思考，并将这思考的过程和结论以刚健有力的文字书写出来。

重读这部文集，书名“难以攀登的美”再次引起我的关注。作者是一位成就颇丰的散文家，其《高路人云端》《在前人已有答案的地方》《废墟的辉煌》《山河气象入梦来》等文集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位有着数十年写作经验的资深散文作家，当其众多精品为人们所称道、好评并频频获奖之时，却对散文创作有了新的认识，产生了散文之美难以企及的感叹，我想这正体现了一位严肃作家真切的创作体验。对于一位执着于文学追求的作家来说，艺术的高峰永远在崎岖险峻的前方；而随着自身创作经验和审美眼光的提高，对于文学境界、美学境界的追求也会不断提升，此时，审美眼光的高度往往决定了写作成就的高度，这当是一种普遍艺术规律。因此，追求的困惑、审美的迷茫、攀登的艰辛，就成为一位不断走向新的高度的文艺家必须经历的过程。